

《大声》周刊介绍

赵 可

《大声》周刊于1937年1月17日在成都创刊,由中共地下党员车耀先和一批爱国进步青年主办,历时一年零七个月,是成都地区宣传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的著名进步刊物。

一 《大声》的诞生及发展历程

西安事变爆发后,全国出现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成都各界对时局发展极为关注。以经营“努力餐”饭馆为掩护,致力于成都抗日救亡和中共党组织重建活动的车耀先决定以最短时间公开出版一份刊物。1937年1月17日《大声》周刊诞生。车耀先任社长,薛特恩主管发行,周海文、彭文龙、胡绩伟任编辑,社址位于祠堂街172号“努力餐”饭馆楼上。

《大声》创刊号声明其宗旨为:“介绍现代知识,讨论时事问题;站在国民立场,督请政府团结御侮;强化民族意识,拥护中央抗日救亡;大声疾呼,唤起民众;辅助教育,服务国家。”《自我介绍——代发刊词》表明该刊的座右铭为:“假话宁可不说,真话总要说点”;“与救亡图存不相干的废话不说”;“理论歪曲和虚构事实的文字不载”。

《大声》的问世冲破了国民党当局把持四川舆论的局面,对推动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作用。该刊由此遭到地方当局的迫害,4月17日《大声》出了第13期后,被政府以“消息言论

多不正确’的借口查封。

在车耀先的努力下,《伙声》更名为《伙生》,在成都暑袜街继续出版,“面目虽然不同,声音却是一样”。6月,政府当局又以‘更名出版,言论更为荒谬’为由,将仅出版5期的《伙生》周刊查封。

在广大读者的支持和援助下,车耀先等又在成都东御街筹划出版《图存》周刊。拟于7月9日出版的第1期印毕待发时,七七事变的消息于8日传到成都。为尽快对此作出反应,当天由胡绩伟赶写的宣言《以血肉的抗战答复敌人的侵略!》以图存社的名义立即散发全城。但是,7月24日该刊第3期出版后即被地方政府取缔,理由是“未经批准,违法出版”。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937年11月5日《伙声》复刊。复刊后的《伙声》“面目虽然一样,态度却有不同”,以“巩固团结,抗战到底”为指导方针来唤起民众。1938年8月23日,在顽固派的百般刁难和重重压制下,《伙声》复刊号出版40期后被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无理查禁,车耀先撰写了《停刊辞》,表示:“今后仍本救亡天职,大声呈请复刊。”这一愿望在当局的高压政策下终未实现。

创刊后4次遭国民党当局查禁,3次变易刊名的《伙声》周刊,总计出版了61期,约一百数十万字。其中:《伙声》13期,《伙生》5期,《图存》3期,《伙声》复刊40期,另外从《伙声》复34号起每期出增刊一份,共出7份。

从创刊到终刊的一年七个月里,《伙声》周刊克服了办刊经费严重短缺和发行渠道不畅的巨大困难,在抗战后方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下坚持办刊。该刊创刊不到3个月就畅销5000份,后来发行到上万份,成为当时四川抗日救亡报刊中出版较早、发行较广、读者众多、影响深远的著名进步刊物。

二 《伏声》的主要内容

《伏声》周刊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37年初创刊到更名为《伏生》后于同年6月被查封；第二阶段是从1937年7月《图存》出刊到1938年8月《伏声》复刊被查封。该刊内容在两个阶段有不同侧重。

第一阶段的主要内容包括：积极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误国政策，促进“对内民主和平，对外团结抗战”局面的早日实现，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在成都地区的蓬勃开展。

这一时期经常给《伏声》撰稿的除车耀先、薛特恩外，还有周海文、彭文龙、胡绩伟、张宣、彭为果、张文澄、车辐等进步青年。

《伏声》创刊后第一个吸引人心的宣传，就是报道西安事变真相，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车耀先针对当局严密封锁消息，歪曲事实以混淆视听的作法，以笔名笠盟发表《宣传和谣言》一文，用收听西安电台记录和摘录的外电报道，将事变真相巧妙地公诸于众。文中既有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也有蒋介石离开西安时的六点诺言，还有各方政治势力对此事件的态度和反应。创刊号中呼吁：“我们民众对西安事件应绝对主张用政治方法解决，不能让人民血汗买来抗战的子弹，自耗在‘中国人打中国人’上面。”张学良被扣留南京后，《伏声》刊发了《望蒋返京望张返陕！》和《今日之张学良》等文，为张辩护，称赞：“光明磊落大勇大谋的张学良，不惟我国历史上少见，即世界各国也不多得。”并且提出应当使“张学良早日回陕整理部曲，还我们举国一致的欢腾！还我们抗战前夜的和气”！该刊还登载了《共产党调停陕变通电》、《十二月前张学良之请缨抗战书》、《十二月张杨对时局主张之通电》（此通电成都仅《伏声》一家全文刊载）等重要文件，发表有《和平解决陕事》、《陕局好转与一二八抗战》等文章。

《众声》抨击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所散布的种种妥协投降谬论,指出亲日派“比公开投降敌人更阴险”。在《纪念伟大的总理,检讨异志的党人》的文章中揭露汪作为孙中山三大政策遗嘱的起草人,现在公然推翻总理遗嘱,还主张与日本帝国主义共存共荣。文章质问道:“这样的党员难道还是总理的信徒吗?”其他如《我们希望于汪先生者》、《汪先生“还跳火坑”吗?》、《感谢汪先生的“救亡图存”之整个计划》等文章,均以犀利的笔锋酣畅淋漓地驳斥了亲日派所谓“妥协和平论”、“感敌论”、“同化异族论”的荒谬。

该刊还特设一些专栏以通俗的语言讲解时事。从第4期至第11期,《众声》连载了胡绩伟以笔名丁一九撰写的《谁胜谁负》通俗讲话,从中日两国的军备、资源、人力以及国际关系等多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阐明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道理,深受读者欢迎。

号召青年学生、妇女和知识分子参加救亡运动是这一时期《众声》宣传的重点。《怎样做个时代青年》等文为青年学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鼓励他们在抗日救亡中“担负起唤醒群众,组织群众和领导群众的工作来”。讨论妇女和救亡问题的专栏《妇女界》,提出“女子是救亡运动的主力军”等主张,呼吁广大妇女:“为着民族的生存,为着自身的利益,都应该起来,积极地去参加反日反汉奸救亡运动!”以达到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的双重目标。张宣在《知识分子开动!》中,满怀激情地呼唤:“民族需要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开动!”《报告文学运动》、《我们要看爱国戏》、《国防文学与创作口号》等文章则希望文艺工作者创作出群众喜闻乐见的抗战文艺作品,“使一切作家的笔变成有力的武器”;并用“那种特殊的武器来巩固我们的国防”。

第二阶段的主要内容包括:谴责日军的侵华罪行;报道战况并歌颂抗战将士;积极宣传中共的全面抗战路线;呼吁巩固和发展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人民的抗日民主权利;揭露抗战后方存在的消极现象和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的严重事件。

这一时期该刊的主要撰稿人,除以前的进步青年外,还有黄宪

章、张志和、沙汀、范长江、邹韬奋、欧俊等社会知名人士。

抗战全面爆发后，该刊发表的《为广州被炸而呼吁》和《反对轰炸不设防城市大会》两篇文章，严厉谴责日寇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罪行，呼吁国际社会对此“作有力的声讨和有效的制裁”。文章还展示出中华儿女对于“抗战一年以来，日寇对我们所施的种种兽行”永志不忘“复仇”的坚定信念。该刊还将日军灭绝人性地准备“散播伤寒毒菌于陕晋冀抗敌意志最坚决地带，以消灭我所有同胞”的罪恶行径公布给大后方人民，并由此发起为前线将士防毒募捐运动。

《大星》复刊后每期均设《战情展览》专栏，先后对正面战场的南京保卫战、山西抗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都有客观详尽的报道。对于川军的抗战活动，该刊予以重点报道。《今天才认识饶将军》、《光荣的死》、《悼刘司令长官》等文盛赞为抗战而牺牲的川军将领饶国华、王铭章、刘湘，称其是“现役军人中的模范人物”。《川军一鸣惊人》、《与赖德祥监军谈话的经过》、《陈静珊将军告诉我们的前线消息》以及来自东西战场的特写、战士的家书等，都反映出川军在前线作战英勇，以致“全国对川军的观感，也为之一变”的情景。

复刊后的《大星》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共的立场，积极宣传全面抗战路线，争取人民的抗日民主权利。社评《抗战！抗战！抗战！》指出：“我们唯一希望就是全国抗战！敌人最害怕的也是全国抗战！我们唯一生路也只有全民族最英勇的抗战！”该刊还转载毛泽东、周恩来、凯丰、洛甫、朱德、林祖涵、李维汉、罗瑞卿等中共领袖人物的重要文章，以系统论述全面抗战路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抨击国民党仅仅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

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开幕，4月1日大会通过《抗战救国纲领》。《大星》对此作了积极的宣传报道。车耀先的《建国的新动向》等文，高度评价了此次大会的意义，同时希望政府“除了将这些进步的决议继续发展外，在最短期内，一一地把它实现出来”。该刊发表的《谈保甲》、《对于今后川政当局的期望》等数十篇文章，对国民政府和四川地方当局提出迫切的改革要求和许

多积极的改革建议,以推动国民党逐步实施和完善《抗战建国纲领》,扩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民主权利。

在大力宣传报道成都地区慰问抗战军人家属、欢送川军抗战大会、抵制日货、市民反侵略大会火炬游行等群众性抗日救亡活动的同时,《伙声》对于抗战后方某些人不顾国难当头,仍然歌舞升平,趁机大发国难财的消极丑恶现象予以尖锐的抨击。《国难不敢到成都》、《太太“世界”》、《请严究大阴谋案》、《关于袁萧的事件》、《“逃亡”不是“游历”》等短评、杂感,均以百余字针砭时弊、激浊扬清。《一个负伤归业的战士的呼声》及《黄诚寨土豪毒打抗战军人家属》、《优待抗战军人家属声中——战士夫人又遭毒打》等文,反映出负伤战士与后方军属的苦痛,呼吁地方政府予以帮助和照顾。该刊与国民党顽固派压制抗日救亡运动、迫害爱国民主人士的反动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顽固派一手炮制的“凤凰山机场事件”、“川大稻草案”、“郫县群力社事件”和“天府中学事件”等,都有详尽的追踪报道和深刻透彻的分析评论,彻底揭露了顽固派压制进步势力、破坏救亡运动的阴谋,也教育了广大中间势力。

《伙声》周刊还发表了不少关于抗日救亡的小说、散文、诗歌、漫画、杂文、报告文学等文艺作品。这些作品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备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最富有特色的是以四川人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金钱板来宣讲中国军队在各前线浴血抗敌的事迹,文字通俗,音韵和谐,寓教于乐,很受读者欢迎。该刊的木刻漫画也很有特色,《帝国主义目前的恐惧》表现出日本侵略者在斯大林和蒋介石并肩而立所象征的中苏合作及强大武力面前举手投降的情景,将抗战的光明前途揭示出来。趣涛的报告文艺《离京之前》,生动描述了南京沦陷前夕的情景。作者充满激情地写道:“再会吧,南京!我们四年来的友谊,将会在凯旋的时候重温的。”这篇文艺作品与同期发表的社论《南京没有丢掉》相配合,对坚定四川军民的抗战必胜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 大声周刊社的活动

《声》诞生不久即成为成都地区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喉舌,大声周刊社也很快成为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和领导核心。1937年3月14日,由大声周刊社等36个社会团体联合发起的“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以后相继发起成立了“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和“成都大声抗敌宣传社”等救亡团体。

1938年初,大声周刊社设立文化服务部,组织时事座谈会,讨论群众关心的一些问题,如《中日绝交后之我国外交》、《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怎样开展成都救亡工作》、《如何保卫山西和武汉》等,并将讨论情况及时在《声》上辟专版发表。

为推动成都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广泛深入开展,大声周刊社还组织了慰问抗战军人家属、捐赠“杀敌光荣”铜牌等活动,起到了动员广大市民团结一致支持抗战的良好效果。沙汀、力民等在《声》上连续发表了反映这些抗日救亡活动的系列文章。

大声周刊社的上述活动对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者为四川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李仲明)